

中国管理学发展史 · 近代以来

王圆圆◎著



清华大学



中国管理
学发展史

近代以来

王圆圆◎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统览了自 1895 年以来将近 120 年的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论述的是广义的中国管理学发展概况,包含了治国、治生、治身、治金等诸多学问,融汇了经济与管理思想的,包括管理理论与实践。

本书包括正式章节 12 章和附录 2 篇,具有知识性、体系性、历史性、通俗性、趣味性等特点,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史鉴”读本、管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学原理”等专业课的教材、MBA 与管理类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管理知识爱好者的通俗读物。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史/王圆圆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5324-9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管理学—思想史—中国 IV. ①C9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152 号



责任编辑:朱敏悦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3.75 字 数:42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9.00 元

产品编号:055273-01

前 言

关于近百年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陈佳贵教授指出：中国管理学百年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前的“管理学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8年的“管理学初步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融合发展”阶段。^① 谭力文教授、包玉泽博士以“20世纪中国的管理变迁”为题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部分：1900—1949年中国的企业管理；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及管理；1949—1966年中国的企业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变革。^② 其他学者的划分标准各有不同，并且大多数论述重点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而本书统览了1895年以来将近120年的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实在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安放好自己的位置。”^③ 通过对比整理、总结近百年来中外管理学发展历程，笔者发现：与西方管理学主要侧重和集中于组织的管理尤其是企业的管理不同，相比较而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具有六大特点，创建中国管理学也必须基于这六大特点才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可能性。^④

第一，是广义的管理学，不是狭义的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全面包含治国、治生、治身、治企之学，治国、治生、治身之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尤以治身和

① “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2年年会召开，陈佳贵讲话，祁金立、姜源功分别致辞。<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2/09/18/010333516.shtml>.

② 谭力文，包玉泽：《20世纪的管理科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第1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3年。

④ 王圆圆：《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六大特点》，《管理学家（学术版）》，2013年第4期，第69～76页。

治国之学为甚。例如近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就是由于西学无法解决国人以下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后恢复文化自觉和自信、提升话语权、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需要；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进行抗争、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培养国家“软实力”的需要；社会浮躁期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归属感的需要；开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①正如1699年德国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tz）在《中国最新事物》一书“序言”中特别提到的：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②而治企之学也只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近20年才逐渐形成的，且尚未形成大的气候，以致有人戏称：“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是可有可无的‘男三号’”。^③

第二，经济与管理思想不分家。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间很早，管理学独立出来的时间却很晚，目前也没有完全独立出来。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1996年才有管理科学学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才开始设置管理学研究项目，以前精力都放在应用经济学部分。经济学家“越界”成为管理学家的很多，反之却很少，“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主攻公司治理和金融的郎咸平教授，就更多地以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的身份示人。因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示人，对很多事物都可以指指点点，而管理学家的对策却有诸多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往往出于世俗的思维和偏见。基于第一个特点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不可分。西方学者可以很顺利地写出一本经济学或管理学甚至细化到某一个具体的学科如人力资源、会计学的思想史专著，但我国学者却很难写出一本精准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思想史专著。这是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三，管理实践引导管理理论发展。我国的管理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密不可分，甚至实践发展在前、理论研究在后。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科学，其发展的

① 王圆圆：《国学与管理》，《管理学家》（实践版），2007年第7期，第39～44页。

② 转引自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序言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前言第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与管理实践的需求,^① 理论研究着力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实践问题;多数情况下,实践派管理专家比学术派管理学家对企业人士的作用更大、更直接、更迅速。例如:“娃哈哈—达能纷争事件”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东方的伦理式关系与西方的契约式关系如何融洽相处难题的序幕;1995年4月全国试点企业集团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内学者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会每年不定期公布须在短期内完成的应急研究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不定期发布重大招标项目。在中国的企业人士中,曾仕强、余世维的名气比很多学术派管理学家的名气要大得多,唯一一个既有学术水平、又受实践领域欢迎的可能只有郎咸平。一位研究供应链的资深教授说过一句无奈的话:“我获得的各种奖项无数,唯一的遗憾是很少有企业应用我的研究成果。”在同行圈子中被“文人相轻”、实践领域又不被接受的学术派管理学家大有人在。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和问题在近几年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第四,探索中前进的特征很明显。由于国土辽阔、人员众多、事务繁杂、缺乏借鉴,中国历史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很多;与西方同时期的大量管理理论创新不同,我国的众多制度创新就是最大的理论创新;很多看似偶然性很强的关键人物^②和关键事件^③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比较明显,

① 陈晓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我国管理科学》(1986—2008),第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② 包括大人物与小人物。大人物,比如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同志、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小人物,比如引发雇工大争论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手工打造廉价汽车的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完全可以写成《小人物的大历史》这样一本皇皇巨著。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两书中,这样的小人物非常多,并且两书差不多都是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这完全符合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历史观:“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如何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③ 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伟大壮举。从附录1也可以发现,有些年份的重大事件特别多,而有些年份却几年都没有重大事件发生。苏勇等的《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8—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诸多重大的管理事件。

“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非常突出。^① 曾鸣教授的“大赌大赢”观点不仅贴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优秀企业的迅速成功之道，而且也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些有胆识的企业家、政治人物的做事特点。在“转轨+新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大量既不合法（法律不让做）、又不违法（大家都在做）的“灰色地带”，在这个地带行走主要靠运气和胆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别人被抓住、自己没被抓住，或者被抓住很快被放出来，活下来就会成功。例如：被邓小平三次谈话提到的年广九就是运气特别好的例子。年广九的儿子也如此评价其父亲：“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二是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势，既不超前做先烈，更不落后没得吃。张瑞敏决定做海尔工业园的时候遭到很多下属反对，因为当时经济政策还未明确。张瑞敏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做事哪有不冒风险的，一件事能做不能做，不是看它有没有风险，而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风险中的机会。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讲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明白？不该快的时候你快是错误，该快的时候你不快也是错误。要是等上面的具体政策都很明确了，那大家一窝蜂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风险是没了，可机会也没了。”基于此，网上有一条幽默段子：“搞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如同没见过足球的人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一样，而且上阵之后才发现组织者也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边定规则、边做裁判，急了还不时上来踢两脚。继续留在场上的人，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的运气真好。而被罚下场的人当中，真有些人是很冤的。”这段话说得实在是非常贴切。

第五，很多问题提出的时间很早，但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有三：（1）由于当时思想的禁锢，很多问题由于违背“大局”，很难被提出。从历史规律来看，提出者往往是考虑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高层领导人（例如邓小平提出关于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三个标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或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例如由吴稼祥等引发的关于“国营企业股份化”问

^① 联想公司创始人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最初经营联想时通过了一些“灰色”手段，例如向有资格的国有企业购买进口指标、在黑市购买外汇等。当时大家都这么做，但是一旦被追究就是违法，若不被追究，就是不违法的。华西村书记吴仁宝也是这么做的。在人民公社时期，华西村偷偷办营利性的小工厂。上级来检查的时候，厂门一关、工人全部去农田里生产。上级刚走，工人马上回去继续工作。正是依靠这些小工厂，贫穷的华西村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还在为能否办厂争论不休的时候，华西村的家底已有100万元固定资产和100万元银行存款，为以后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题的争论、张维迎提出的国家所有制下国企的“五个不可能定理”)或触及生存底线的基层农民(例如小岗村的生产承包制);(2)由于当时国情、体制和利益群体的限制,问题可以被提出,却难以被解决。例如:1986年张维迎就提出了国企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近30年了仍未解决;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制定了劳动制度改革的系列规定,那个时候开始就应该没有“铁饭碗”的,但现在却持续出现“考公务员热”。又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但现在很多企业却仍然在做表面文章。即使对于微软这样强势的跨国公司,自1992年进入中国经营后也一直没有解决软件盗版侵权的问题;(3)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太快,使得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刚被提出就过时了。例如:1959年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安全生产问题,但至今安全仍是关键生产问题之一;1989年国务院就对企业临时工的管理做出了明确的原则规定,但现在“临时工现象与问题”却仍然非常突出。

第六,整体发展崎岖坎坷,但局部不乏亮点,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在理论方面,1945年,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54年,钱学森教授第一次提出在工程设计和实验中能够直接应用的关于受控工程系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1982年,华中科技大学邓聚龙教授创建了有世界影响的灰色系统理论;1986年,北方交通大学贺仲雄教授等创立的FHW(模糊、灰色、物元空间)决策系统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是决策科学中一项具有国际水平的创造性成果;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施振荣提出西方管理学界高度赞誉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后将其改造为“产业微笑曲线”以作为台湾地区各种产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1998年,张瑞敏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坛,“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正式写进哈佛教材,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登上哈佛讲坛;2005年,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创刊并被SSCI检索系统收录……在实践方面,1987年,美国《幸福》杂志评选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中信公司的荣毅仁榜上有名;1997年,美国《家电》杂志公布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海尔超过GE、西门子等世界名牌,名列榜首;1998年,松下、西门子、惠而浦等著名跨国公司为小天鹅定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洗衣机和电冰箱;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并“三分天下有其一”;2001年,海信集团成功收

购韩国大字集团设在南非的生产电视机的工厂，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国外收购国际化公司的资产；2003年，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组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企业——TCL与汤姆逊电子公司，这是中国家电企业首次兼并“世界500强”公司主流业务；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向全球发布的最新“全球最强势100品牌”排名中，中国移动以品牌价值392亿美元排在微软、通用和可口可乐之后，居全球第四名，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类似的亮点数不胜数。因此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有增强学术自信的勇气，中国企业家应该有傲视全球市场的信心。

基于中国管理学具有的上述六大特点，本书论述的内容并不是狭义的管理学，而是广义的、包含了治国、治生、治身、治企诸多学问的、融汇了经济与管理思想的、包括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管理学。当然，本书论述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力求论述的条理性、完整性、科学性与可读性。最终形成本书的正式章节共12章和附录2篇。

第一章“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相当于全书的总论。第二章“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三章“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论述了优秀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与特征。第四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五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六章“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国营工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村级管理制度以及舆论管理。第七章“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管理”论述了国家管理、公营企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和村级管理制度。第八章“中国管理学的萌芽”论述了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高校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中国管理学萌芽的标志。第九章“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对苏联管理模式的引进和推广、管理学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引进与创新、“文革”期间管理学的整体停滞与局部发展、企业管理科学化、管理学科发展与高校教育、第一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章“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企业管理科学化、管理现代化与高校教育、第二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一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企业管理创新、企业管理科学化、未来我国企业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任务、当代管理学与管理教育、第三代

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二章“中国管理学的新发展”论述了中国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主要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及其缺陷、未来我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任务。

为了弥补正文叙述的遗漏，本书特别在附录1中列举了近代以来比较重要的中国管理学事件。为了与国外同时期管理学发展进程对照以及更好地理解提及的相关国外管理学理论，附录2中列举了近代以来比较重要的外国管理学事件。此处由于某些著名理论无法归结于具体的年份，所以忍痛割爱没有收录进去，例如麦克莱兰（David C. McClelland）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三种需要理论”（成就需要、权力需要、亲和需要）等。由于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如此精准有趣的国内外管理学大事记，所以此举也算是有意义的尝试。对于某些事件是否属于“重要事件”，仁智有别，只是基于笔者个人思考的辑录。对于附录中的重要事件，笔者专门用“★”标出，以求与其他事件区别。

本书具有知识性、体系性、通俗性、历史性等特点，因此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史鉴”读本、管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学原理”等专业课的教材、MBA与管理类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管理知识爱好者的通俗读物。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	(1)
一、总体脉络	(1)
二、具体脉络	(2)
第二章 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 (1895—1911)	(10)
一、时代背景	(10)
二、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	(12)
三、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	(14)
四、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	(15)
五、洋务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24)
第三章 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 (1895—1949)	(26)
一、时代背景	(26)
二、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	(32)
三、民族实业家管理思想的特征	(49)
第四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 (1895—1927)	(55)
一、时代背景	(55)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56)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68)
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管理思想 (1911—1927)	(70)
一、时代背景	(70)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71)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80)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的管理 (1927—1949)	(82)
一、时代背景	(82)
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	(83)

三、国营工业的管理	(87)
四、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	(91)
五、村级管理制度	(95)
六、舆论管理	(97)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管理 (1927—1949)	(100)
一、时代背景	(100)
二、国家管理	(101)
三、公营企业的管理	(106)
四、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	(111)
五、村级管理制度	(113)
第八章 中国管理学的萌芽 (1900—1949)	(119)
一、时代背景	(119)
二、企业的科学管理	(120)
三、管理学著(译)作	(121)
四、管理专家	(125)
五、高校管理学教育	(127)
六、管理社团组织	(135)
七、调查研究	(137)
第九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学 (1949—1977)	(140)
一、时代背景	(140)
二、对苏联管理模式的引进和推广	(142)
三、管理学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	(146)
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引进与创新	(152)
五、“文革”期间管理学的整体停滞与局部发展	(154)
六、企业管理科学化	(157)
七、管理学科发展与高校教育	(159)
八、第一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	(162)
第十章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学 (1978—1992)	(167)
一、时代背景	(167)
二、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	(170)
三、企业管理科学化	(172)
四、管理现代化与高校教育	(179)

五、第二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	(186)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学 (1993 年至今)	(191)
一、时代背景	(191)
二、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	(194)
三、企业管理创新	(197)
四、企业管理科学化	(200)
五、未来我国企业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任务	(204)
六、当代管理学与管理教育	(206)
七、第三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	(214)
第十二章 中国管理学的新发展 (2000 年至今)	(223)
一、中国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	(223)
二、中国式管理理论简述	(227)
三、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缺陷	(237)
四、未来我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任务	(242)
附录 1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大事记	(246)
附录 2 近代以来外国管理学大事记	(305)
参考文献	(354)
后 记	(364)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农抑商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关于商业方面的文化蕴涵，它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以至于形成了所谓“儒商”的传统。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商朝据说就是“以商兴国”的典范，秦始皇也曾经为一位女性富商筑台以示褒赏，秦汉以后形成了“工商士民”的阶层结构，汉武帝时的桑弘羊等大臣都出身商人阶层。近代的徽商、浙商、晋商，无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引申到企业管理之中而创造出奇迹的。^①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历史久远的管理思想，管理思想的发展是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从上古传说时期萌芽、夏商周时期产生、秦汉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承接、鸦片战争后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后自成特色。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管理学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片面到系统、从思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对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本身就是我们对管理思想、理论变化、社会变迁，乃至对组织变革的本质性认识，但是国内学者对中国管理学发展脉络的研究至今仍然不够全面和清晰，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② 笔者已经对此做过一些尝试。^③

一、总体脉络

按照管理思想史专家许康教授的观点，总体来看，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见图 1-1）：

① 王圆圆：《国学与管理》，《管理学家》（实践版），2007 年第 7 期，第 39～44 页。

②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有“五朵金花”之称（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只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本书主题有些许关系。

③ 王圆圆：《近代以来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管理科学》（人大复印资料），2007 年第 3 期，第 78～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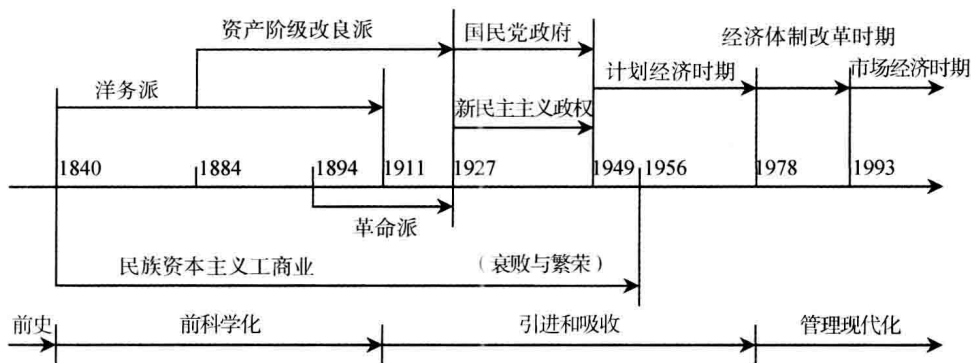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1) 中国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前史”时期（16—19 世纪前期），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形式的经营管理、军事管理和科技管理。

(2)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前科学化”时期（1840—1911 年），主要特征是传统管理形式（封建管理体制）的没落和资产阶级早期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

(3) 引进和吸收科学化管理时期（1912—1977 年），时代背景为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及其他理论开始形成并逐渐引进我国，以 1949 年为界又可以划分为上、下两个阶段。

(4) 全面推进“管理现代化”^① 时期（1978 年至今），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得到发展、企业自主性增强、管理科学自主创新成分增大，现在仍处在这个阶段。^②

二、具体脉络

上述划分不无道理和逻辑，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具有动荡、变迁和变革的特征，中国管理思想并不是按照线性规律均匀发展的，其中一些分支的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这又是现有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按照笔者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管理思想可以按照下述的发展脉络进行分析（见图 1-1）。

^① 管理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包括企业运行过程科学化、管理思想和理念的现代化、战略思维的系统化与开放化、组织文化的民主化和管理学体系的完整化等。

^② 许康，劳汉生：《中国管理科学化的历程》，第 4 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1. 鸦片战争以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封建政策,根本不存在正式的工业,仅有一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小商品经济以及尚未形成规模的封建手工业。当时的社会等级排名是“士、农、工、学、商”,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此时的管理主要是僵化的封建国家管理和尚且发达的军事管理,并非由商人进行的科技管理也比较发达。

2. 洋务派

西方国家的炮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却也将遵守条约的“契约精神”示范给清政府,“契约精神”的普及则为现代公司^①的诞生准备了养分。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蜂拥而入。我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继对其仿效,自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兴办了一些我国早期的近代工矿企业,由此形成中国近代管理思想最早的两个主要来源: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1864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②同年,恭亲王奕訢在呈递给清帝的一份奏折中也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③早期的洋务派企业正是在这种技术主义迷信的前提下形成的。以“经世致用”为主要指导思想的今文学派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特征是重技术、不重管理,即学习西方的技术,搞技术主义迷信,基本不改变封建制

^① “公司”一词源自爪哇和外围岛屿通商口岸定居的客家人的方言“kung-sze”,他们通常将商行的执行人称作“kongsi”,此类人在南洋等地非常普遍。一本荷兰百科全书对“公司”进行过比较精确的定义:“公司是一个汉语里的词,它在很广泛的意义上指行会、合伙以及社团。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在群岛地区(荷属东印度)的使用很普遍,后来这个词在荷兰语以及不同的土著语言里都很流行。从字面来说,它的意思是一般大众的管理和公共事务的执行。”从汉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公司”就是“公共管理”。中国公司的兴起是与中国在海外的采矿工业的勃兴密切相关的,是从采矿业的小型合伙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股份公司最初在同治时期(1862—1874)引入通商条约。

^② 吴晓波:《跌落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第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③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三)》,第4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度。例如李鸿章就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也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近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这导致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这次失败标志着洋务派求强路线的破产。但由于暂停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洋务事业在甲午战争后反而进入一个高潮期。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此时洋务派的管理思想才算彻底破产。洋务派创办的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官办（主要是军工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其中官督商办企业所占比例最大，而官商合办实为官督商办。总体来看，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相比军工企业要有所提高。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有：浓厚的封建性、严重的殖民地性、重技术而不重管理等。

3. 民族实业家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以前重农抑商），由此逐渐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民族实业家阶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性质、作用与洋务派企业都很不相同，其最初出现可以追溯至1852年粤人郭甘章出资在上海虹桥兴办的船坞。在扭曲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要紧抱“洋”和“官”的大腿，这种先天的羸弱注定了它们无法健康成长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致经过以下几个时期：19世纪50年代初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的40多年，为产生时期；1895—1913年为初步发展时期；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为进一步发展时期；1923—1927年国共分裂为危机与萧条期；1927—1949年出现了两种情形，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呈现出衰退和破产的情形，在解放区则呈现出恢复与发展的情形。比较著名的早期民族工商业集团有：荣氏申新、茂新、福新集团，张謇的大生集团，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集团等。比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有：郑观应、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卢作孚等。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的主要优点有：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和”的优势；善用自身优势，创造名牌产品；“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在他们优秀经营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族企业以弱敌强甚至以弱胜强，与外资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经历的时间跨度最长，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完成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